第 1 期(总第 178 期)
2023 年 1 月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No. 1 (General No. 178)
Jan. 2023

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

付文军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毕生最为重要的发现,它是马克思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武器”,也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范式。在对“经济事实”进行经验抽象的古典范式和对“经济行为”展开主体想象的思辨范式的积极扬弃中,马克思确立了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并借此展开了对“物质的生活关系”的科学解剖。以唯物史观为内在思维方式,马克思科学地确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任务,并深刻回应了困扰人类已久的“历史之谜”。由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才堪称“一门历史的科学”,马克思“历史科学家”的称号也才名副其实。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继续秉承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立足“中国大地”,以当代“中国事实”为逻辑起点;解释“中国道路”,以回应“中国问题”为理论任务;体现“中国特色”,以“社会主义”为发展原则;服务“中国人民”,以引领“时代潮流”为责任担当。以此为基础,“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人类社会;《资本论》;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F0-0;B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23)01-0106-14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23.01.010

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理论板块,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中的两块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地。长期以来,由于深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我们在研究中很自然地将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分别划归到经济学和哲学这两门学科体系之中。由此,便造成了“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与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两张皮,彼此分离、相互脱节”[1]的状况。割裂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联系而展开分门别类的研究,会造成两种理论困难:一是滞留在哲学的基地之上论及唯物史观的问题,虽能对唯物史观有一原则性的认知和把握,却难以切实体会社会历史结构变迁的深层经济根由,继而可能会陷入对唯物史观的抽象理解和教条式吸纳;二是仅限于从经济学视角来研究政治经济学,虽能够对社会经济现象展开有说服力的学理性解释,却只能展开对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和回应“人类之谜”的实证诠释,继而遮蔽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过程中的丰富性维度。有鉴于此,深入挖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之间的内在关联,一方面将有助于捍卫马克

收稿日期:2022-1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社会哲学思想研究”(21CKS030)

作者简介:付文军,男(土家族),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资本论》的基础理论研究。

思思想的整体性和呈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另一方面也将有助于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和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发展。

一、政治经济学的古典范式:对“经济事实”的经验抽象

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是诞生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一门独立的科学”。[2]422政治经济学要通过对分工的研究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2]422这一目标的达成不仅依赖于流通,更要在生产领域中完成。一旦经济学家们开始认识到这点,并将研究视域聚焦于生产过程,“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3]就开始了。诚如恩格斯所言,政治经济学就是用以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4]的科学。为了探明工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运行规律,以斯密和李嘉图为卓越代表的“古典学派”应运而生。“古典学派”作为先进分子,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污垢、提高生产力、使工商业获得新的发展的资产阶级”,[5]615他们的目的和使命也只在于“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5]615可以说,财富的生产和占有是“古典学派”所要探讨的核心要旨。在此基础上,政治经济学古典范式的理论特点得以展示,其理论缺陷也暴露无遗。

“古典学派”在对社会事务的经济剖析中暴露了它的不彻底性。深受苏格兰历史学派的影响,加之自然科学的启发,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开始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的学术求索之路。对斯密和李嘉图来说,他们所面对的是当时世界的头号商业帝国——英国,工厂手工业得到了广泛发展。正因如此,“古典学派”的经济学研究要紧紧围绕工场手工业和社会现状而展开,他们积极探讨了“市民社会”的历史起源及其发展历程。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抽绎出了相关的经济线索和经济规律,继而诠释了经济现象和社会政治之间的关联。在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和军备等问题的讨论中,斯密论及了“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6]40三种政体类型,这些政体是靠经济来维系和构型的。对于政府的起源,斯密认为“造成财富不均的对牛羊的私有,乃是真正的政府产生的原因”[6]41。政府、政权等政治现象的出现,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保障财产”。[6]41更为明确地说,“保护富者不受贫者侵犯”[6]41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政府是伴随财产权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存在。不仅如此,斯密还以分工为始端开启了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考察,并论及了不同国家和制度中财富的不同发展历程。斯密以此来呈现政治经济学是为“政治家或立法家”[7]3服务的科学。由于李嘉图所预设和面对的是一个稀缺性的世界,他要探讨的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进。在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考察中,李嘉图以捕猎为例阐发了他对价值的基本看法,即“野物的价值不仅要由捕猎所需的时间和劳动决定,而且也要由制备那些协助猎人进行捕猎工作的资本(武器)所需的时间和劳动决定”[8]。在这一基础上,李嘉图论及了资本主义的分配问题并剖析了工人、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三者之间的对立,以此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经济缘由。可见,“古典学派”的经济研究是以现实的经济事实和社会生活为基础的,他们探讨了这些社会经济现象的历史与现状。然而,囿于阶级立场和著述目的,“古典学派”的经济研究又不会将历史的研究方式贯彻到底,他们虽然探讨了财富的增进和价值的衡量等诸多社会经济问题,但却没有展开对一些社会经济现象的寻踪觅迹。在斯密那里,他通常都是将社会上的经济现象视为既定事实,继而展开对外部现象的考察和揭示,他着重考察的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深入下去分析这种关系背后所蕴含着的历史性的生产关系”。[9]24在李嘉图的视界中,“人”是不存在的,他所关注的只是“物”。“把人变成帽子”[5]597的李嘉图将其理论支点“完全放在了客观存在的经济现实之中”,[9]110他虽然有意识地将阶级利益、工资和利

润、利润和地租之间的对立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但在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他“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天真”想法。[2]16他们之所以只流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外部考察而不对社会性生产关系进行历史性批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旦触及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就必须要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面相,不仅会使蕴藏于社会交往之中的剥削、不公的情形得以曝光,而且还会呈现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及其历史命运。正因如此,“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都将一些常见的社会经济现象(如分工、信用、货币和资本等)“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5]598。他们虽然解释了这些经济范畴的运动规律,但对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5]598却缄口不言。他们虽然展示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史并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却根本不谈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及其结局。如此,他们便将资本主义打造成了一个亘古长存的“坚实的结晶体”。[2]10在他们看来,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本主义则是“天然的”。人为的封建制度必然不是完美的,它要为天然合理的资本主义所替代。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5]612,这些所谓的关系理所当然地“不受时间影响”而成为“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5]612总之,“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虽奉行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历史性诠释,但他们却未能将这一方法贯穿于研究过程的始终。在问题的症结处,他们又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之中。

受经验主义氛围的熏陶,“古典学派”秉持着一种经验归纳式抽象分析法则。“自斯密开始,古典经济学家就将自然科学中的经验论唯物主义方法引入经济事实的研究中”[10]48,继而探究社会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为了论证市场经济,以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构造了“经济人”的理论模型。按照经济事物的“本性”,人受到各种利益驱使和支配,利己貌似就成了人的本性。“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7]28当然,这一认识既是基于对经济事物的直观体认,又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谋利特质的深切感悟。除此之外,经济人假设得以风靡的深层原因还在于它实现了对经济现象的抽象把握和具体感知并开始运用“抽象力”来“分析经济形式”。[2]8一方面,要对经济行为进行分析,就要掌握行为主体的动向。在探究国富民裕之道的过程中,首先要看到追求财富并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行动的重要作用。只有以此为基础,对经济行为、经济规律的真实而有效的把握与分析才不至于陷入空谈。另一方面,要从整体上对社会经济问题展开解剖,就要抽象出一种“共同性”。在斯密那里,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共性是“自利”,受利益支配的人由此而结合成社会乃普遍原则。在一定意义上,经济人假设是对资本谋利需求的一种现实性描绘,是斯密基于那些为资本所累之人的一种理论抽象和假定。由此,每个人的活动及其关系都被抽象化了,人和财富之间的外部关联也得到了清晰的展露。可以说,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完全按照这种当事人所看到和所设想的样子,按照事物决定这种当事人的实践活动的情况,按照事物实际上呈现出来的样子,来描绘事物”[11]242的斯密所采用的方法依然是经验归纳式的抽象。身处资本主义“新时代”的李嘉图不再纠结于经济生活的表象,提出了要探寻“这个制度的表面运动和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是怎么回事”[11]184的学术宣言。虽然他抓住了“事物化和客观化了的生产关系”这一“现代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本质”,并“以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作为观察社会历史的全部出发点”,[12]58-59但依旧在事关社会经济本质的内在复杂关系面前畏缩不前。可以说,“古典学派”的经济研究始终是一种外在性探讨,即他们始终是在生产生活与抽象的社会关系之间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展开知识性表述的。基于经验的归纳和抽象只是将事务的外部联系视为本质关联,经济本质为繁茂的经济现象所遮蔽。

“政治经济学的功能是观察事实,发现事实后面的真相,而不是描述生活的规则。”[13]或言之,深受经验主义的影响,古典经济学也认同正确而合理的科学应该展开对“可观测的客观世界”的直观描

述并尽可能发现客观世界的“事实和现象”[14]的观点。为此,政治经济学家们展开了对“经济事实”的实证研究和经验抽象。这样的形而上学的研究范式也为近现代经济学所吸收并成了主流。遵循“以假设—推论为范式承诺的发展道路”,近现代经济学家们力图建构一个既具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严谨性”,又“可以实现描述方法的精致化和计量化”[15]的理论范式。这一研究范式依靠精密的数量模型和精准的计算公式而使他们的研究貌似变得科学,然而这样的研究和“古典学派”并无二致,也不过是“力图刻画出一个形式精美而没有历史过程的抽象图景”[15]而已。总之,政治经济学的古典研究范式所彰显的是非批判的和不彻底的经济学,它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而不是将其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2]16

二、政治经济学的思辨范式:对“经济行为”的主体想象

由于缺乏政治经济学生长的土壤,作为“外来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是“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2]15德国的。德国特殊的历史状况就“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2]18,因此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教授、专家“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2]18。他们将英国和法国的经济现实的理论表现变成“教条集成”,[2]15并用“精神”去解释社会经济现实。黑格尔作为“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的“唯一的德国思想家”,[16]他率思辨理性透视了市民社会的本质与规律。黑格尔的理性思辨范式为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所吸收,并广泛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中。

“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使他深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中,他的哲学思考也具有了社会历史的规定性。”[10]41根据张一兵教授的研究,黑格尔在法兰克福当家庭教师时就已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耶拿大学时期开始了对古典经济学的全面研究和反思。[12]68-69在黑格尔的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观点很少以直接的理论形态表现出来,而时常隐匿在哲学话语的背后”[12]70。不仅如此,“古典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理论规定”也“间接地表现为黑格尔哲学面向现实的关键性逻辑环节”。[12]70在黑格尔看来,政治经济学就是从“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17]232。黑格尔借助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而展开了对市民社会中需要体系和劳动方式的分析。在黑格尔的思路里,“以自身为目的”的“特殊的人”必须要“通过同他人的关系”而取得“普遍性的形式”以“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17]224-225个人的这种从“特殊”到“普遍”的自我实现就是市民社会的“原则”,通过对劳动的社会性结构的解析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一原则的思辨特质。对黑格尔而言,“特殊”就是与“意志的普遍物相对抗”的“主观需要”,它既需要通过“外在物”(别人需要和意志的所有物和产品)而得以满足,又需要通过“活动和劳动”来实现。[17]232可见,为了达至“普遍”,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就成了“一种为他人的存在”,[17]235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关联的抽象规定。“个体满足它自己的需要的劳动,既是它自己的需要的满足,同样也是对其他个体的需要的一个满足,并且一个个体要满足它的需要,就只能通过别的个体的劳动才能达到满足的目的。——个别的人在他的个别的劳动里本就不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在完成着一种普遍的劳动,那么同样,他另外也还当作自己的有意识的对象来完成着普遍的劳动;这样,整体就变成了他为其献身的事业的整体,并且恰恰由于他这样献出其自身,他才从这个整体中复得其自身。”[18]可见,为了达至“普遍”,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劳动就成了“一种为他人的存在”,[17]235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关联的抽象规定。沿承这种思辨的分析思路,黑格尔还指认了分工的产生及其作用。由于人们需要的多样化,满足需要的手段也不断丰富起来。随之而来的是“抽象化引起手段和需要的细致化,从而也引起了生产的细致化,并产生了分工”[17]239。分工一方面使得个人劳动

变得简单并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的技能,继而使得劳动产量大增;另一方面,分工使得“特殊”的个人对于社会联系的依赖程度加深,“技能和手段的这种抽象化使人们之间在满足其他需要上的依赖性和相互关系得以完成,并使之成为一种完全必然性”[17]239。不仅如此,就机器生产这一普遍无奇的事件来说,它也是生产抽象化的结果,“生产的抽象化使劳动越来越机械化,到了最后人就可以走开,而让机器来代替他”[17]239。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5]205的黑格尔在论及劳动、分工、需要和机器等话题时一直在强调其抽象性,他是在思辨领域展开对这些论题的研讨的。基于黑格尔思想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通过他对劳动等论题的抽象思辨而窥见他处理社会经济问题的方式——思辨式的逻辑运演。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精准地指出了黑格尔的问题——“把帽子变成了观念”[5]597。虽然黑格尔有意借政治经济学来切近社会现实,但思辨理性的主导分析思路却让他远离了这一目标,他的所有言说都只是在思辨领域中的逻辑展开,社会现实并不在他的言说基础当中。

黑格尔之后,蒲鲁东在经济学上卖弄起了黑格尔的表达和思考方式。“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5]601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所要叙述的是“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并声称自己发现了经济理论自有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系列”。[5]598之前的经济学家将分工、信用和货币这些经济现象和关系视为固定不变的永恒范畴,而未阐明其历史运动。蒲鲁东则力图确证这些范畴和关系的来历。不过,由于蒲鲁东“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他运用“经济学家的教条”而从“纯粹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5]598-599仿照黑格尔关于理性的辩证运动过程——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群”,继而产生出“系列”和“整个体系”[5]601,将这一演进序列运用到对经济范畴和社会关系的考察中,就会得到“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5]601对经济事实的抽象考察,思辨逻辑的必然性与经济联系的必然性二者得以结合。将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视为“原理”和“范畴”的化身,并“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5]602这是蒲鲁东惯用的手法。基于此,蒲鲁东展开了对经济范畴的抽象阐释。以分工为例,它被视为“一种永恒的规律,是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5]618。也正因如此,一些“抽象、观念、文字”就足以清晰地说明各个时代的分工。在蒲鲁东看来,“种姓、行会、工场手工业、大工业”都可以“用一个分字来解释”。[5]618显然,蒲鲁东是脱离经济基础来展开对分工的论述的,这样的分析跟历史进程和历史事实是有出入的。以竞争为例,蒲鲁东认为“竞争是工业竞赛,是自由的时髦方式,是劳动中的责任,是价值的构成,是平等到来的条件,是社会经济的原理,是命运的法规,是人类灵魂的必然要求,是永恒公平的启示,是划分中的自由,是自由中的划分,是一个经济范畴”[5]633。蒲鲁东实际上要说明“竞争的必然性”并确证“它的永恒性是一些范畴等等而专门颁布的一道法令”。[5]632他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也是因为他并不懂得竞争与当时社会现实之间的必然联系,竞争被变成了“非现实的人类灵魂的某种必然要求”。[5]633由是观之,蒲鲁东对于社会经济范畴的言说和分析都是脱离现实的,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5]602而已。如此,蒲鲁东的经济分析只是等而下之地套用了黑格尔的表达,其不彻底性也就充分暴露了出来,它无益于准确把握住经济事实本身。

理性思辨的分析范式对于社会经济范畴的概念反思和逻辑推演是有其独到之处的,它使得一切社会经济范畴都可以在思辨的领域展开其自身的规定,并由此建构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社会经济范畴与经济现象都在理性世界中得到了清晰的展示,运用思辨哲学而展开的经济分析范式也合乎逻辑地构建了带有浓烈思辨色彩的经济学体系。当然,这一研究范式的目的也与古典经济学殊途同归,未能达到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理解而不能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的实质性和彻底性的批判。这样的研究范式不过是对经济行为的“主体想象”而已,它并不能直戳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

三、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范式:对“物质的生活关系”的经济解剖

由于遭遇到“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19]411的困难,尤其是在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论辩中,马克思开启了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决心。面对现实的经济问题,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哲学均无法实质性地解决问题。马克思在积极扬弃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开启了对社会现实的考察与省思之路。按照“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9]412的原则,马克思开始深掘一切社会政治现象背后的根源——“物质的生活关系”。[19]412简言之,马克思是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互动”中解剖社会问题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因此而不再是那种面向经济事实并汇集、整理材料的实证科学,也不再是对社会经济进行理性逻辑判定的思辨科学,它直接宣明了这一理论不仅要对经济现象进行合理解释,还要阐释经济现象所蕴含着的社会和历史的整体框架。就此而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这种唯物史观范式恰好印证了恩格斯的著名论断——“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4]。也正因如此,恩格斯在为《未来报》写《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时才理直气壮地指出:“贯串于全书的历史观念不允许作者把经济规律看做是永恒的真理,而把它仅仅看做是某种暂时的社会状态的存在条件的表述”[20]30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二者之间是相互拱卫的,唯物史观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原则和根本方法,更是与政治经济学融为一体的“整钢”。

其一,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它并不是要探讨一切时代的政治经济问题,而是要以资本主义为特定的研究对象。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就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8。这里已经交代得很明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展开对这一社会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科学界定,显然是得益于唯物史观的伟大发现。在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早就阐明了人类历史活动的起因及其状况。“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5]531这种“生产”不仅是基于生活常识的一种切身体验,更是一种置身于现代社会的客观现实。“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5]531在思辨世界中凌空蹈虚的古典哲学无意揭穿生产这一人类社会的“世俗基础”,妄想构筑永恒国度的古典经济学虽触及生活与生产却无法洞穿其真谛。马克思则不然,他敢于深入社会之中,并竭力将研究的视域从“天国”降到“尘世”。在对“粗糙尘世”的考察中,马克思明确了要“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19]413去发现解释现实和展望未来的道路,要按照“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9]412的分析原则去直面和把握问题的根本。也正因如此,马克思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直言:“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21]22。将“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视为出发点并直面“物质生产”,此即表明了马克思已经彻底抛却了“理念”生有万物的观点,也彻底摒弃了探讨单个人的直观思路。深入物质生产当中并以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的人为出发点来剖析现实和历史,这便是唯物史观把握问题的方式。正是立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这一现实的基座之上,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人”(更准确地说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雇佣工人、资本家及其他社会主体等)为前提,以他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为研究对象,继而洞悉在生产过程中藏匿着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要言之,整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对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主体的资本主义应用和结合展开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中所敞

显的关系的全面把握。由是观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历史性的规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历史的产物和塑造着历史性的社会关系,“而不能将之永恒化、超历史化,并推广到所有社会”[10]47。

其二,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融通。“方法”是马克思留于后世的宝贵财富,“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22]48。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史观与经济学研究不再是一种外在性的关系,而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即唯物史观不再是从外部表现为经济学分析和批判的哲学前提与尺度,而是直接转化为经济学研究的内在方法和内在思维方式”[23]。“由于同德国资本家商定要出版那部著作,我就把《政治经济学》的写作工作搁下来了。因为我认为,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必要的。”[24]这是马克思对自己中止政治经济学的创作而集中精力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因的描述。也正是在这部“论战性著作”完成之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迈向了一个新台阶。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视为社会历史发展和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动力,这一观点贯穿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始终,也深刻地影响着马克思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方面,马克思善用辩证法而科学地回应了人类历史之谜。在科学的基座之上,马克思唯物地改造和使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他创造性地剥去了黑格尔方法中的“神秘外壳”,而将概念辩证法打造成关于事物和事件本身的辩证法。如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能在实实在在的经验之地上展开。在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力主要唯物、历史且辩证地分析所在的世界及其关系,强调从事物内部的“否定性”入手来探究事物的新陈代谢规律。由此,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自我摧毁”、阶级结构的“直接对立”和经济范畴的“自我矛盾”出发既回应了资本主义的诞生之谜,又解答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命运。如此方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言说和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解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充分彰显了辩证法的革命特性和批判本性,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肯定理解中包含着对其的否定批判,将资本主义现实视为一个暂时的存在加以考察并在不断的运动中把握其本身。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将现在的社会视为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10-13,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因而对马克思的方法产生“恼怒和恐怖”[2]22之感。另一方面,马克思还制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科学道路。唯物史观所要显示的是马克思把握人类历史的现象与本质,深入追踪人类社会的本质性规定。易言之,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这一“度”中去,透视人类社会本质与规律,是唯物史观的理论担当所在。为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贯彻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知路线。在马克思看来,“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是从“抽象的规定”出发,而后回到一具有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21]41最终“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1]42。《资本论》及其手稿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这一分析思路和认知法则。以劳动为例,马克思先探讨了抽象的一般劳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2]56,而后才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是一般劳动这一抽象的规定在具体生产方式之下的一种“再现”,它兼有一般劳动所具备的普遍性和雇佣劳动所带有的特殊性。正是凭借对这一方法的运用,马克思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的诸多“具体”。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才有效地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结合起来,资本主义的本质与现象、历史与逻辑才得以透彻地研究和全面地叙述。

其三,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制定。唯物史观是要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则,展开对社会基本结构、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历史变迁等问题的全方位透视。具体而言,马克思从事关人们吃、喝、住、穿的“简单事实”——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出发,继而探求“人类历

史的发展规律”。[25]这一要求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得以落实,马克思以英国为典型案例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过程的批判,而不是简单的物的批判或笼统的社会关系的批判。”[26]可以说,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一方面,马克思从最基本的经济范畴和经济关系入手而呈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内容。围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以我们耳熟能详的商品为始端、以资本为核心而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阐析。资本的外在形态与内在本质、资本存在的制度根基、资本运作的市场机制、资本积累的社会后果和资本危机的经济反应等都得到了清晰展示。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的《资本论》三卷才分别分析了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对于马克思来说,一切经济范畴都不过是生产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而已。因此,资本虽然要以厂房、设备、机器、燃料和其他辅助材料等“物”的形式而存在,但究其根本它却是一种为物所中介了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2]878可以说,无论是马克思论及的商品、货币、劳动、分工,还是资本等经济范畴,它们都蕴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经济范畴在某一方面决定着物的社会关系,它把人作为经济关系的代理整合到自身之中。对经济关系的分析是一种双重批判:第一,它指出早期古典经济分析没能充分描述这一运动;在这个意义上,批判分析是古典经济学的继续:它纠正了后者的矛盾与不足并给出了一个更深刻也更普遍的分析。第二,这也是马克思理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批判的关键所在,它把经济范畴的实际运动展示为人的社会运动的一种物化形式。这一批判发现,物的社会运动的范畴是人的社会运动的必要的和历史上转瞬即逝的实存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作为对经济范畴的双重批判诞生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作为对生产中的人与物的历史辩证法的分析诞生的。这里的生产被理解为客观财富与客观社会关系的社会的—历史的生产。”[27]也就是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通过对经济范畴的“人格化”的批判性分析而呈现了经济行为当事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货币和资本范畴蕴藏着的权力关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另一重要内容在于,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两大最重要的经济学理论而深刻地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问题及其发展状况,为三大人类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学支撑。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在现代社会中工人并没有得到他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作为报酬”[20]317这一论断作了理论论证。通过劳动价值论,广大工人不仅深刻了解到自己的劳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到底能够创造什么样的价值,还对自己的劳动计酬标准和依据有了一个全面的认知。通过剩余价值论,广大工人受剥削、受压榨的“证据”得到了充分展现,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也得以充分暴露。有基于此,广大工人开始剥夺剥夺者的行动有了强有力的“批判的武器”。简言之,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一切现实的经济矛盾运动的分析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28]。人类社会从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发展到自由个性阶段也就有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其四,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理论旨归的开显。唯物史观可以被看作一种“应该怎样写历史”的“纲领”,[22]311马克思就是按照这一“指示”而展开政治经济学研究和书写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历史唯物主义旨在完成“改变世界”的承诺。“改变世界”的过程可以简要归结为在“批判旧世界”中“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而“发现新世界”。遵循从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市民社会的解剖之道的原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完成了对“此在世界”的批判,并探寻了“彼岸世界”的真理。换言之,唯物史观通过对历史的科学回溯和本质追问而回应了“改变世界”何以可能的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是在对资本主义这一特殊存在的历史性批判中落实了“改变世界”的哲学宣言和理论抱负。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和资本关系的分析而找到了资本主义的症结所在。“改变世界”的宣言要得以落实,就要切实回应世界为什么要改变以及如何改变的问题,也即“批判旧世界”何以可能的问题。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为我们辩证地呈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资本主义具有双重面相,它一方面开辟了一个生产力

快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人类文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另一方面则导致广大无产阶级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资本侵蚀、劳动异化、经济强制、抽象统治和商业欺诈等散布到了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这样一个世界,马克思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2]822劳动和资本的这种“有害的分离”,使得工人和资本家要各归其位,也就此决定了二者不同的命运——“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2]205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考察,马克思还确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乃“旧世界”无法根除的顽疾,它也是马克思判定资本主义要被历史所淘汰的重要理据所在。另一方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批判的武器”。虽然有学者判定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所有武器中最重要的武器之一”[22]312,它的存在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自己看清形势,为了使它在这种明确认识到的形势中能够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去正确地行动”[22]313。而要真正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全面激活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仅靠唯物史观的理论说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政治经济学提供一些实证数据和模型公式来直观地体现无产阶级的现实境遇。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显示了资本增值背后的压榨和剥削,剩余价值率给出了劳动者受剥削的计算公式和直接证据,两大部类的划分阐释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运作原理……一切问题的肇源就在于资本,“批判旧世界”的核心要旨就是要“消灭资本”。[20]316瓦解资本逻辑,取得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工作的重心所在。质言之,马克思要将“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29]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29]手里,以“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874

在马克思那里,唯物史观提供了一种科学的研究范式,即“按其真正的本质理解过去事件的一种科学方法”,继而“使我们有能力从历史的角度(科学地)考察当代,不仅看到当代的表面现象,而且也看到实际推动事件的那些比较深层的历史动力”[22]312。政治经济学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证明了这一方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是践履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典范。可以说,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就是真正以从事现实活动的个人为前提,以“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为依据,以“抓住事物的根本”为特点,以探寻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为任务,以解答人类“历史之谜”为目的的“彻底的”和“说服人”的理论。[30]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中国化时代化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学也逐渐“迈入新时代”。[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新时代”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场域,“社会主义”确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性质和方向,“中国特色”确证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要求与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立足当代中国国情及经济发展实践产生的政治经济学,是时代化、中国化和理论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立足中国实际、体现中国特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和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出谋划策。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是摆在每一位政治经济学研习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立足“中国大地”,以当代“中国事实”为逻辑起点。实践是理论之源,理论是对实践的总结和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理论,它源于对“中国大地”所提供的素材和场域的整合。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长提供了空间与平台,“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31]339

和“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31]340,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都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素材”。离开中国这一场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难以冠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二字既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的限定,也是与在“西方”场域中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模式相区别的关键所在。“中国大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足之地、滋养之所。当然,立足“中国大地”并不是说要将研究视域局限于“中国”,而是要以“中国”为根基来“放眼国外”和“放眼长远”。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要以“中国事实”为逻辑起点。“中国事实”可以理解为当下中国的具体实践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情(实际状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32]。开掘这些“富矿”就是我们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具体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的实际”,“新时代”就是我们思考、言说和行动的时代背景与具体实情。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3]14。为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要积极回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相关议题,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和发展动力等。当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以它们为逻辑起点,在对“中国现实经济关系和现象的深入观察和理论剖析”之中形成对“中国事实”的“学术刻画”,[15]继而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善和发展。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解释“中国道路”,以回应“中国问题”为理论任务。我们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34],我们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勤劳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人民迅速从水深火热中“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了。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引领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康庄大道,中国人民始终要“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35]。面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从正面科学解释这一现代化道路得以成功的秘诀,又要义正严辞地驳斥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者对它的污蔑和误释。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对“中国奇迹”的深刻领悟和把握中科学地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使命,积极地回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理据,全面地确证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任务,妥善地处理好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立足“中国事实”,我们不仅要从中找到引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方法,还要向世人解释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密码,“让世界认识一个立体多彩的中国”。[36]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要积极回应“中国问题”。“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32]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3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也是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在我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33]7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能熟视无睹、缄默不言,而应以破析和解决这些问题为目标。可以说,积极回应“时代之问”,为充分化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提供智力支援,为“强起来”的中国完美融入世界提供实践策略,此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旨和理论任务所在。“时代”是“出卷人”,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习者是“答卷人”。明晰我们的身份,积极回应“时代之问”,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体现“中国特色”,以“社会主义”为发展原则。我们应该明确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又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学理论。就前者而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有过指导性的意见和原则性的表达,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指导思想。历史上出现过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自治式的南斯拉夫模式、民族式的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古巴的格瓦拉社会主义等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模式,然而这些模式都在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中败下阵来。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人类社会史上的一次创举,它既无现成的模板,亦无可以直接搬用的指导理论。中华儿女创造性地将中华民族和中国实践的特色内嵌于作为“舶来品”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中,形成了“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和“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38]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即是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带有了极强的民族风格、民族特色和民族气质,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就后者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汲取了西方经济学的优势与长处,但它跟西方经济学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经济学利用一系列数理模型、计算公式为达到“物尽其用”的效果,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在“物尽其用”和“人尽其才”之间找到了平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遵循其“社会主义”方向,即要以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的)生产方式为对象,集中力量研讨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与运动规律,以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根本归宿。论述至此,我们必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决不是“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简单叠加,即“中国特色 +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必然推导出(或等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按照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本方略来构建的一个有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我们独具特色地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引进来和走出去、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等的有机结合,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凸显出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原则的有机对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中,我们必须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向不断展开探索。在实践层面,我们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要创造一种既超越传统社会主义又超越发达资本主义,集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于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39]。在理论层面,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继而不断发展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简而言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必须始终按照“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的要求,“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32]

其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服务“中国人民”,以引领“时代潮流”为责任担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有其鲜明的阶级基础,它是站在“人类社会”的立场和高度之上为工人阶级发声、呐喊的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以“经济”的方式来研讨“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通过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完成了对“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表述”和提出了“为消灭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的政治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产物,也要秉承马克思的理论传统和践履马克思的理论抱负。细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服务中国人民为宗旨,必须以“以人民为中心”为研究工作的根本遵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33]136这是对我们提出的新要求,我们应该竭力做到理论研究、

人民情怀和现实关切三者的融贯,并将其落实到具体实践之中。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通过深入调研而察实情、出实招以切实做到“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33]138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反映时代要求、回应时代呼声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关键一环。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全球化进程中谋求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方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着重研讨的问题和目标。我们一方面要着力推进社会生产方式由传统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智能(数字)经济的科学转换,另一方面又要积极推动传统公有的所有制结构向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方向发展。面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适应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以全面推进工业化进程、完成市场化转轨为主要课题,以全面构建工业化、市场化的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为主要目标,真正完成全面实现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任务”[40]。这里便牵涉一个核心的问题,如此行事是“为了谁”的问题,也即我们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服务的目标问题。显然,引领中国经济实践适应新时代、新世纪的要求,其根本目的还在于服务中国人民,继而惠及世界人民。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善于“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31]350,并能切实做到“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31]350。因此,只有充分反映广大人民意愿和要求,才能真正顺应时代潮流并引领时代朝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35]简单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与实践就是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根植人民”。[4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理论,这是它最大的优势所在,也是它能够适应并引领新时代的关键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产物,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普遍原理和中国样本这一具体实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长和发展,既有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滋养,又依靠其秉承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唯物主义的立场、辩证的分析法则和历史的视野要求我们首先要立足于中国现实本身(或以当代中国为研究样本),坚持国内和国际、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分析思路,以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并为世界人民的幸福安康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五、小　结

通观政治经济学思想史,“如果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作一种超历史的存在,那么在这个关系性的背景上,剩下的就只是没有社会关系规定性的物与人,这构成了古典经济学家的一般理论视野……当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永恒化时……才能产生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10]53。马克思能够在政治经济学思想史上出其类、拔其萃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丰富的历史性思想。如此,马克思才唯物、辩证且历史地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解剖”和对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性透视。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习者必须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并实现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面向新时代的中国现实,面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习者必须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内容和逻辑的诠释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规律结合起来,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运用、检验和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

具体来说,当代的研习者必须要立足现实,摆正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入手来分析一切社会经济现象,并从中给出具有说服力且具

可行性的阐释方案。如此,推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进程并建构一门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历史科学”也就不是空谈了。同时,新时代的研习者必须要树立家国情怀,推出一批批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原创性成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真正具有家国情怀的经济学,它既不是干瘪的理论说教,又不是呆板的术语堆砌,而是带有鲜活的现实感和庄重的历史感的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亦是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习者不能故步自封而缺乏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揭示,不能亦步亦趋而缺乏最为宝贵的批判精神,不能人云亦云而丧失关切人类解放的价值情怀。当代的研习者必须要“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42]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服务主体,从而体现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学术担当和肩负的社会责任。总之,当代研习者“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集中力量构建带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31]338以期更好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32]以更好的状态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21世纪的繁荣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峰明.《资本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微观基础——以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为例[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11):78-90.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76.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3.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坎南,编.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M].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7]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8]彼罗·斯拉法,M.H.多布.大卫·李嘉图全集:第一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6.
[9]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10]仰海峰.《资本论》的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2]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13]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M].党国英,刘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0.
[14]托马斯·A.博伊兰,帕斯卡尔·F.奥戈尔曼.经济学方法论新论[M].夏业良,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78.
[15]金碚.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承诺[J].管理世界,2020(9):11-17.
[16]卢卡奇.青年黑格尔[M].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3.
[1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8]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65.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3]丰子义.《资本论》唯物史观的呈现方式与独特作用[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6):4-16.
[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73.
[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1.
[26]唐正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基础[J].哲学研究,2019(7):21-28.
[27]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M].刘玉贤,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

147.
[28]程恩富,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2.
[29]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1.
[30]付文军.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与科学指向[J].经济学家,2021(1):5-14.
[3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32]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8-25(2).
[3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3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3.
[3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36]习近平.让世界认识一个立体多彩的中国[N].解放日报,2017-1-1(1).
[3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
[3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1.
[39]杨春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问题[J].经济研究,2016(8):4-16.
[40]于金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民族性与时代性探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7(5):21-29.
[4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54-56.
[4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5-19(2).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search Paradigm of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FU Wenjun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as the most important discovery of Marx's life. It was an important weapon in Marx's analysi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and also an important paradigm for Marx to engage in political economic research. In the positive sublation of the classical paradigm of empirical abstraction of "economic facts" and the speculative paradigm of subjective imagination of "economic behavior", Marx established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launched a scientific dissection of "material life relations".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the internal mode of thinking, Marx scientifically determined the research object, research method, research content and research task of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profoundly responded to the "historical mystery" that had troubled mankind for a long time. Thus,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can be called "a historical science" in essence, and Marx's title of "historical scientist" is also worthy of its name. In the new era,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continue to follow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ased on the "land of China" and taking the contemporary "facts of China"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we explain the "China road" and take the response to the "China problem" as the theoretical task; we embod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take "socialism" as the development principle; and we serve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leading the "trend of the times". On this basis, we "write the paper on the land of the motherland", and constantly open up a new realm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uman society; Das Kapital; research paradigm

(责任编辑　孙　豪)